台灣歌謠的前復光研究文獻

莊永明

「歌謠」的意義，向來極不確定，「一是合樂與徒歌不分；二是民間歌謠與個人詩歌不分」（見朱自清：中國歌謠）。詩經魏風園有桃有：「心之憂矣，我歌且謠。」這句話中的「謠」字，有人解釋爲：舞。毛傳說：「曲合樂曰歌，徒歌曰謠。」「徒歌」的註解，也有不同意見，有「獨歌」、「行歌」。辭源的註解：「有章曲曰歌，無章曲曰謠。」這種有音樂的是歌，無音樂的是謠的定義，是筆者所要寫的：「臺灣歌謠」的範疇。

研究臺灣史學、民俗的陳漢光先生曾發表一首明鄭民謠於「臺灣風物」第五卷第七期：

「刺瓜（黃瓜）刺、刺、刺，
東都着來去，
來去允有菜（妻），
不免唐山（指大陸）怎艱苦。」

據陳漢光的推想，此謠是「鄭氏入臺灣之後，清廷實施遷界政策之時所產生的，那時，閩廣沿海居民被迫離海三十里，居民流離顚沛，哭聲載道，成功乃招之來臺開墾。」詞中「

東都」是鄭成功時代臺灣的稱呼，而「唐山」係指大陸，「允有某」，似係泛指生活上的安定或另有一番意思，而非爲娶妻而渡海來臺。曾任職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」編纂三十餘載的廖漢臣先生表示此謠成於明鄭，頗可置疑，總之，文獻記載的空泛，我們難以判斷眞僞。

江日昇撰「臺灣外記」所載，在鄭氏時代，流行「文正公兮文正女」歌，褒揚鄭克藏夫人陳氏的殉節，這段文字，該是漢族的歌謠，在臺灣文獻最早的記錄。可惜當時歌謠很少傳存。

清康熙六十年（西元一七二一年），臺灣有朱一貴之亂，平定後，遂有巡視臺灣監察御史之設，滿漢各一員，黃叔璥以「廉靜有才識」被舉爲漢御史，是爲首任巡台御史，留臺二年，撰「臺海使槎錄」共八卷，卷一到卷四是「赤嵌筆談」，卷五到卷七是「番俗六考」，卷八是「番俗雜記」。「番俗六考」記述北路諸羅番及南路鳳山番的風俗習慣，並附有「番歌」三十三首，每首歌都有漢字標音和原歌的譯詞。

余文儀編撰的「續修臺灣府志」，收錄了這些資料，包括了「愛情」、「工作」、「狩獵」、「祭祀」、「頌祖」、「飲宴」諸類的歌謠，有詞無譜，無法做音樂的研究。日人佐藤又一在「民族學研究」第二卷第二號，發表「臺灣府志所載熟番之番歌」一文，以語言學的觀點對這些番歌加以若干探討，黃叔璥所蒐集的工作成果，應是最早的研究山地歌謠文獻。茲抄錄兩首，以示當日的記錄方式：

阿猴社頌祖歌

咳呵呵咳仔滴咻老（論我祖）
振芒哄斜連　（實好漢）
礁呵留的七七　（衆番無敵）
礁留七七連　（誰敢相爭）

蓬山八社情歌

沉郎揚葉嘆窩呀離乃勞（夜間聽歌聲）
末力呀戈達些；（我獨臥心悶）
末里流希馬砌獨夏噫嗄喃，
（又聽鳥聲鳴，想是舊人來訪）
達各聲自歌馬交嗄斗哩，
（走起去看，却是風吹竹聲）
嘆下達寧臨律嘆嗐噫嗄喃呀微！
（總是懷人心切故耳！）

註：這首「番歌」所描寫的意境和「望春風」多麼相

似。

一九一一年（清宣統三年，民國前一年），因戊戌政變流亡日本的「飲冰室主人」梁任公（啓超）爲考察日本據臺「治績」，以爲建設祖國的借鏡，於農曆二月底由神戶啓程來臺，臺灣聞人林獻堂邀約地方人士親往基隆碼頭迎接，遺老們在臺北大稻埕東薈芳（現延平北路永樂市場入口處附近，是當年稻江最出名的菜館）旗亭舉行歡迎會，席間梁任公曾作演講，並賦詩志懷；「三月三日遺老百餘輩設歡迎會於臺北故城之薈芳樓敬賦長句奉謝」的七律四首長詩中有「萬死一詢諸父老，豈緣漢節始沾衣。」、「破碎山河誰料得，艱難兄弟自相親。」等句；任公留臺時日不多，但影響甚巨，他和與祖國隔離多時的遺老們懇談，啓示「本是同根，今成異國」的臺灣同胞應效愛爾蘭人抗英方法，武力反抗，徒增犧牲，應厚結日本中央顯要，以牽制臺灣總督府對臺人的苛政。他的建議，對日後「非武裝抗日」的臺灣民族運動，啓廸良多。

梁任公履印臺灣兩週，有「海桑吟」成集，值得一提的是他蒐集改寫的「臺灣竹枝詞」十唱。「臺灣竹枝詞」的前面有一篇小序：

「晚涼步墟落，輒聞男女相從而歌。譯其辭，惻惻然若不勝谷風、小弁之怨者，乃掇拾成什，爲遺黎寫哀云爾。」「臺灣竹枝詞」十唱，計二百八十字，抄錄如下：

郎家家在三重埔，妾家家在白石湖。
路頭相望無幾步，郎試回頭見妾無？
韮菜花開心一枝，花正黃時葉正肥，
願郎摘花連葉摘，到死心頭不肯離。
相思樹底說相思，情葉情根深似伊，
樹頭能得相思子，問子相思知不知？
手夯柴刀入柴山，柴心未斷作柴攀，
郎自薄情出手易，柴枝離樹何時還？
郎搥大鼓妾打鑼，稽首西天媽祖婆，
今生受救相思苦，還乞相思來世多。
綠陰陰處打檳榔，饒得蚶醬持勸郎，
願郎到口莫嫌澀，個中甘苦郎細嘗。
芋芒花開直勝筆，梧桐剪尾西照日，
郎如露裹太陽花，妾似風前出頭葉，
敎郎早來郎恰晚，敎郎大步郎寬寬。
滿擬待郎十年好，五年未滿愈心肝，

蕉肥長大難遮陽，蕊花雖好不禁霜，
蕉肥蕊老有人食，款哥郎行愁路長。
郎行贈妾猩猩木，妾贈郎行蝴蝶蘭，
猩猩血淚有時盡，蝴蝶低垂那得乾！

梁任公以「中國之新民」自號，他那筆鋒常帶情感的文字，點燃了當代中國學子的思想，而他以另一種風格寫成含英咀華的「臺灣竹枝詞」十唱，表露了寶島敦厚質朴的風土人情。「竹枝詞」這種詠誦風土瑣事的七言絕句，本就和民間歌謠相互影響，任公之作，不脛而走，人人琅琅上口，難怪以後文人墨客也都好爲竹枝詞之作，而重視民間歌謠。

一八九五年（光緒二十一年），日本竊據臺灣，積極推行殖民政策。一九〇一年（光緒二十七年），在臺北刊行一本研究臺灣舊有風俗習慣的「臺灣慣習記事」雜誌，有署名採訪生者，於第二卷第七號發表「臺人的俗歌」一文，採集「西仔反歌」和「臺灣民主國歌」各乙節。「慣習記事」係竊臺初期，爲求了解臺灣，所作的資料蒐集，是故錄記反日歌謠，亦不忌諱，採訪生序言說，兩首俗歌，「沒有什麼旨味，却可以想像當時民情的想法是怎麼樣。」至一九一〇年（民前二年），李漢如和日人伊藤政重，組織「臺灣新學研究會」發行「新學叢誌」，闢有「臺謳」一欄，刊載情歌，續刊三回，計錄八首，就廢刊。李漢如曾在該誌第三號發表叢誌之目的，有云：「漢學爲東洋文化之源頭，熠耀二十餘朝，彪炳四千餘歲……大哉漢文學！偉哉漢文學！」

一九一七年（民國六年），當時「臺灣總督府編修課日人平澤丁東編印「臺灣的歌謠及名著故事」，收蒐民歌、童謠二百餘首，由臺北晃文館刊行，是爲蒐集臺灣歌謠專册的嚆矢。

一九二一年（民國十年），「臺灣總督府」臺南地方法院檢察局翻譯官片岡巖編著：「臺灣風俗誌」，該書第四編第一章及第二章分爲「臺灣之音樂」與「臺灣之雜念」，內有「駛犁歌」、「採茶歌」、「病囝歌」、「搖籃歌」、「生蕃歌」、「乞食歌」、「褒歌」等。

一九二二年（民國十一年），本省第一位留日音樂家張福興受「臺灣總督府」之聘，於春季前往日月潭，以兩週的時間採集當地民歌十三首和僅有演奏的杵音兩首，後由「臺灣省教育會」出版「水社化蕃杵

音及歌謠」，附有民俗、歌詞等簡單註釋，這本小册子的研究成果，是臺灣的音樂家從事採集山地民歌的濫觴。

過了三年，一九二五年（民國十四年），與張福興同在「臺北師範學校」任教的日人一條愼三郎也採集了阿美、排灣、布農和泰雅的民歌三十首，仿張福興書例編印「阿美族之歌」與「排灣、布農、泰雅番謠歌曲」兩集。依史惟亮的判斷，計十四首阿美族、布農二首、泰雅一首，另可能爲排灣兩首，卑南十一首。

一九二六年（民國十五年），「若草會」編著「俚謠粹吟」出刊。另有張淑子（豐原人）的「教化三昧集」問世，張氏將一些勸善性質的俚諺、童謠、謎語輯集成册，以「文以載道」爲取捨標準，相違的情歌，概不採錄。

越年（一九二七年），鄭坤五編刊「臺灣藝苑」雜誌，特闢「臺灣國風」欄，蒐錄歌謠和俗曲，計收「四季春」等四十餘首，創文藝雜誌刊載情歌的先例。

一九三〇年（民國十九年）九月九日，臺南南社及春鶯吟社同人，創刊「三六九小報」，月逢三、六、九日發行，八開四面，形同小報。設有「黛山樵唱」專欄，陸續刊登了百餘首歌謠。

以「爲擁護臺灣人全體利益之言論機關」（見第三百六十四號該報「餘錄」）臺灣新民報，於一九三一年（民國二十年，昭和六年）一月一日，發表醒民：「整理歌謠的一個提議」。文中表示他每日見及小孩子們在唱日本兒歌，音義都不懂簡直是鸚鵡式的「咿啊」，如能教以固有的歌謠使他們能瞭解其意，於兒童趣味生活上不曉得有多大貢獻，進而擴及「流行於民間「成人的歌」，這項整理歌謠的目的「動機雖是非常單純，但是其實意義却很深重，……而在如我們這樣的特殊情形之下的，更有一層爲日就廢頓的固有文化的保存上不可不作的目的」。這項整理臺灣歌謠的計劃獲得「臺灣新文學導師」賴和（號懶雲）和全島同好的支持，他們殷切的寄望：

「這種工作若得成功，或者可以使憂鬱成性的我們民族，引起了民族的詩的發展亦未可定了。」

在異族的統治下，說出這種於愴惻中含着期望的心語，意義是多麼的深長。「臺灣新民報」因而開始

開闢「歌謠——歌謠零拾」專欄，和「漢詩界」（古體詩）、曙光（新體詩）並列爲「副刊」。這項成果可觀，所集數量之多及搜集範圍之廣，堪稱前所未見。廖漢臣曾論爲：「自此而後，歌謠的搜集，進入另一階段，由無意識而變爲有意識的文化工化，甚至掀起一番熱烈的臺灣話文建設運動。」誠哉斯言。

抗日文人連溫卿於民國十三年十月在「臺灣民報」二卷十九期發表「言語之社會的性質」，闡明語文和民族的關係，他說：「言語和民族的敵愾心是一樣的」。他的觀點是：殖民地的語文政策就是以統治國的語文來蝕化被統治者的語文，因此他又發表「將來之臺灣語」來强調設法保存臺灣語，並加以整理、改造的必要性。越年，張我軍在「臺灣民報」五週年紀念號發表「新文學運動的意義」，提出兩句標語：「白話文學的建設，臺灣語言的改造」，主張「改造臺灣語言，以統一於中國國語」，他認爲臺灣話有不少是有音無字，沒有文字可表達，因此主張宜將臺灣話改進爲合理的、有文字的「中國的國語」。這兩位文學家分就「民族立場」和「文化立場」表明拯救「臺語」於不墮的關懷。延至一九二九年（民國十八年），史學家連雅堂再度提出整理「臺語」的責任，他在「臺灣民報」二八八期以「臺語整理之頭緒」提及：「余，臺灣人也，能操臺灣之語而不能書臺語之字，且不能明臺語之義，余深自愧……余懼夫臺灣之語日就消滅，民族精神因之萎靡，則余之責乃婁大矣！」接着又以「臺語整理之責任」（「臺灣民報」二八九期），說明整理臺語，刻不容緩的理由：「余既整理臺語，復懼其日就消滅也，悠然以思，惕然以儆，愴然以言。……今之學童，七歲受書，天眞未漓，咿唔初誦，而鄉校已禁其臺語矣！今之青年，負笈東上，期求學問，十載勤勞，而歸來已忘其臺語矣！今之搢紳上士，乃至里胥小吏，遨遊官府，附勢趨權，趾高氣揚，自命時彥，而交際之間已不屑復語臺語矣。顚推之氏有言：『今時子弟，但能操鮮卑語，彈琵琶，以事貴人，無憂富貴。』噫，何其言之婉而戚耶！余以僇民，躬遭此厄，既見臺語之日就消滅，不得不起而爲整理，一以保全，一謀發達，遂成臺語考釋，亦稍以盡厥職矣！曩昔余懼文獻之亡，撰述臺灣通史，今復刻此書，雖不足以資貢獻，苟從此而整齊之、演繹之、發揚之，民族精神賴以不墜，則此書也，其爲

玉山之一雲、甲溪之一水也歟！」

這項「臺灣語保存運動」不久演進成「臺灣語文建設運動」（見陳少廷編撰：「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」），黃石輝和郭秋生因揭櫫「將臺灣話文學化」而掀起一場鄉土文學的論戰，此事不涉本文所論主旨，按下不表；黃石輝和郭秋生主張不盡相似，論旨也不盡相同，但兩人言及歌謠創作和整理的對話文建設的重要性是一致的。黃石輝力倡：「用臺灣話做文，用臺灣話做詩，用臺灣話做小說，用臺灣話做歌謠，描寫臺灣的事物」。郭秋生更主張「臺灣語文」的建設工作，應深入到民間文學的檢討，他說：「……打建的地點（指「臺灣語文的建設」工作），的確要找文盲層這所素地啦！……然而這種理想，在那一處可見呢？歌謠啦！尤其是現在所流行的民歌啦！所以我想把既成的歌謠及現在流行的民歌（所謂俗歌）整理，爲其第一有功効的。……我知道這些民歌的蔓延力，有勝過什麼詩、書、文存、集等等幾萬倍。……所以吾輩說，當前的工作；先要把歌謠及民歌照吾輩所定的原則整理。」

一九三二年（民國二十一年）元月一日，「南音」雜誌（半月刊）創刊，臺灣新文學運動的推展中心，已漸由報紙轉移到雜誌來，「南音」最主要的作者是郭秋生，他在「南音」創刊號上的「臺灣話文的討論」，提示基礎的工作有二，其一便是「採集過去的歌謠及現行的民歌」。接着以身作則，爲推廣他「屈文就話」的理論，特闢「臺灣話文嘗試欄」，輯集童謠、（民）歌、（流行歌）曲、企圖把理論付諸行動。

此時，臺灣新文學運動已經邁進了高潮期，「臺灣藝術研究社」、「臺灣文藝協會」、「臺灣文藝聯盟」等文藝結社相繼成立，「向異族統治的抗議，對民族認同的文學」雜誌也接着創刊；旅日臺灣留學生組織「臺灣藝術研究會」，發行「福爾摩沙」雜誌，其創刊號有編輯部長蘇維熊的：「對於臺灣歌謠一試論」。臺北的一羣愛好文藝的年青人組織「臺灣文藝協會」，並於民國二十三年發行「先發部隊」（意即「先鋒隊伍」）雜誌，全部中文，後因統治當局干涉，次年改稱「第一線」，以中日文並刊；兩期都明確地揭櫫出主題，「先發部隊」是「臺灣新文學出路的探討」，「第一線」是「民間文學的認識」；「先發部隊」刊載有陳君玉的「臺灣歌謠的展望」、廖毓文

的「新歌的創作要明白時代的課題」，值得注意的是此時臺語流行歌曲正趨於「圓熟時期」，古倫美亞（哥倫比亞）、泰平、博友樂等唱片公司大力的灌片發售，而「臺灣文藝協會」的成員如廖毓文、黃得時、趙櫪馬、陳君玉、蔡德音等不少也涉足創作流行歌曲歌詞。「臺灣歌謠的展望」和「新歌的創作要明白時代的課題」這兩篇「檢討過去，以策來茲。」的文獻，惜乎沒有發生「暮鼓晨鐘」的效果，當然，如果我們回顧當時的背景，也就不足爲奇，日本統治階級對臺灣民族運動悍然採行高壓手段，想「潔身自好」的臺灣人只得歌詠「兒女私情」，以吐心中積鬱，「望春風」、「月夜愁」、「心酸酸」……等會風靡當時，並非偶然。「第一線」刋載陳茉莉的「對民謠的管見」，是以「廣角度」來分析民謠，值得注意是編輯後記中指出：我們祖先的遺產，只有臺灣的民間文學算得是最爲純粹，我們不但在文學上有保存它的義務，在民俗學上也有整理它的必要。」「第一線」的任務已由歌謠的收蒐跨躍到民間故事的整理。這段期間的歌謠研究工作，僅限於一羣熱愛「新文學」的青年人，以溫「故」求「新」的心情，而做的努力，沒有「音樂家」的投入，以致沒有音樂理論分析的文字出現。

民國二十五年，臺北「臺灣文藝協會」發行李獻璋編輯的「臺灣民間文學集」，曾以「臺灣人全體的心血記錄，埋葬着未開拓的先民的遺產」爲標題，發佈出版的消息，文中提及：

「如所週知，每一民族的歌謠與傳說，都是其國民的生活之寫照，情感的記錄，又是其智慧的積累，同時是其行動的支配者。

所以『臺灣民間文學集』可謂臺灣人全體的詩的想像力的總合，是應佔有文藝園地頭一頁的美麗花朶，是先民的思想所結晶的金字塔，其中有臺灣人應該知道的初民的宇宙觀、宗教思想、道德標準、重要史料、及對於自然界的認識等等。

臺灣人究竟是功利的，還是勤勉的民族？是信天還是信神？或是信天神合一？白鷺與水牛在相思樹下戲遊着，而我們的婦女會不會唱戀愛的情歌？……

住在臺灣而不知眞的臺灣，臺灣人而不知臺灣人之眞面目，這是何等的恥辱。」

「臺灣民間文學集」集有歌謠、謎語、傳說、故事等，其中蒐集的歌謠近千首；李獻璋在序言指出：

「……倘沒心情鑑賞和探悉臺灣文學也就罷了，如果有這念頭，那麼你便非從全體民族的共同創作着手不可，因爲文人多受廟堂體制的拘束，人生、社會原非其構想所及。只有沒有受過多大的腐儒的薰冶的民衆，纔能把自己的生活與思想，赤裸裸地表露出來。」

民國三十年七月，一本研究臺灣民間風俗習慣的「民俗臺灣」創刊，它是「臺灣人的朋友」日籍的金關丈夫和池田敏雄所編輯，中日學者多人執筆，於臺灣歌謠的採集與研究上，頗多貢獻，當時臺灣大學助教日人稻田尹，得「歌人醫師」林清月之助，對臺灣歌謠鑽研，頗費心思，先後在「民俗臺灣」發表收蒐心得，後整理成册，名曰：「臺灣歌謠集」，於民國卅二年出版，據廖漢臣說，稻田尹在林清月的協助，從水返脚（今汐止）一位老嫗處蒐錄最豐。「民俗臺灣」因與「皇民化」運動相背，遭受當局干涉，但金關等人不爲所屈，努力苦撐，於民國三十三年五月，戰爭接近末期方廢刊。

民國三十二年春天，日籍音樂家黑澤隆朝應「臺灣總督府」的邀請，進行一項空前的大規模山地民歌採集工作，成果甚爲豐碩，四百卷的錄音片和許多樂器資料，還有十卷「臺灣的藝能」電影記錄片。這些資料，經過選擇整理，由「勝利唱片公司」出版了二十六張「臺灣民族音樂」唱片。

也就在這一年，呂泉生從日返臺。他以「呂玲朗」爲筆名，發表採集整編爲合唱曲的嘉義民謠「六月田水」和宜蘭民謠「丟丟銅仔」於「臺灣文學」雜誌第三卷第一、三號。九月二日「厚生演劇研究會」於臺北市永樂座舉行第一次研究發表會，公演張文環原作，林博秋改編「閹鷄」一劇，呂泉生以南管樂、歌仔戲調、民間歌謠爲舞台音樂，頗受好評，尤以適時「皇民化」運動如火如荼的推行着，能够聽聞及這些大漢心聲，是何等不凡的事。

臺灣的新文學運動，受祖國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洗禮而滋長，在異族壓制下，表現了不屈不撓的强烈民族意識，也因此萌發了受統治的智識份子對日本鄉土歌謠整理的熱衷，在藕斷絲連的時代，大陸學者對臺灣歌謠的關心也值得一書。民國十七年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行的「民俗學會叢刊」，有謝雲聲的「臺灣情歌集」，收錄二百餘首，雖然大部份資料係得自泉州綺文堂所刻「臺灣採茶歌」，但是也算難能可貴了。